

第5卷第3期 2012年7月

Vol. 5, No. 3, July, 2012

国际高等教育

国际化问题

高等教育公共财政之十项指导原则.....	87
全球性提升高校水准	89
混乱、商业化、“发表还是出局”	92
大学排名新方法	95
欧洲中世纪大学之往昔与今日.....	97
大学需要什么样的国际咨询.....	100

欧洲学生流动

关于学生流动的欧洲国家政策.....	102
德国学生流动理念	104
对高等教育领导的需求	
投资领导力发展：英国经验谈.....	106
全球化下管理和领导非洲大学.....	108

非洲的高等教育

国际化新纪元下非洲的合作关系发展.....	110
扩大加纳和坦桑尼亚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113

印度的高等教育

商界想从高等教育获得什么：印度一瞥.....	116
寺庙与世界一流大学	119

拉丁美洲的高等教育

智利大学分类的新方法.....	121
巴西的经济增长与高等教育政策是否相关？	123

新书推荐	125
------------	-----

高等教育公共财政之十项指导原则

Arthur M. Hauptman

高等教育财政政策顾问

电子邮箱: Art.Hauptman@yahoo.com

在过去20多年里,我一直关注高等教育所花费的公共资金问题,在此期间,我拜访了20多个国家的多名官员。经常有人问我,某些国家或某个州是否具有示范性的财政体系?在我看来,在高等教育的资金问题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州的财政体系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如何定义优化利用公共资金,更好地支持教育机构以及为学生或家庭提供援助,有如下十条原则可供参考。

民选官员的角色

鉴于高等教育的资金来源于税收,民选官员必须决定高等教育经费在公共财政中所占的比例。所以这一职位不应当由政府任命的官员或非选举官员担任,否则将违背公共责任性原则。

教育机构的主要角色

教育经费的划分程序需尽量避免政治影响。尽管民选官员有权利确定高等教育经费在公共财政中的比例,但他们无权决定高等教育经费的走向及其在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分配方式。非政府性质的中介机构可以避免在经费分配过程中出现政治性偏袒、不公正现象,并且合理地决定资金分配。与政府机构相比,教育机构能更好地分配公共财政。

教育经费、学费和财政援助相结合

拨款机构、学生缴纳的学费和面向学生

的财政援助——这三个领域内的财政政策经常有冲突。例如,教育经费通常是用于提高教学质量,而学生财政援助项目则是为了扩充生源。某些政策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优化的财政政策必须同时服务于这三个领域。例如,财政援助政策需与学费相结合考虑。同样,在拨款阶段需提前考虑教育经费和学生援助的财务分配,而不是将学生援助政策置之不顾,虽然事实上却通常如此。

拨款方案

这些拨款方案中包括并主要根据成本组成部分(cost component)决定每所高校的资金所得。通常拨款方案是根据每所高校学生的实际人均花费或所有高校学生平均花费来计算成本组成部分。但这种方案会导致成本逐步上升,因为人均花费多的学校从政府得到的经费往往较多。但是如果采用标准化成本,即规定学生人均花费而不是以实际人均花费为基准,将有效降低成本,并且鼓励高校更合理地利用其经费开支。

供应与需求

面向学生的学费政策需兼顾供需两方面。传统的财政观念是将学费控制在教学成本以下,如此方可扩充高等教育生源。但事实上,低学费会限制学校的资源,甚至使高校在政府拨款中失去优势。并且,低学费会导致不公平现象的产生,因为高收入学生得

益最多。优化的政策应当以学生的财力为基数、以国民人均收入或中等收入家庭的标准来收取学费。通常，经济衰退会导致学费上涨，而这种以学生为本的政策会有效控制这种不利影响。

保留学费

通常人们关注的是谁负责划分公共职责、确定学费标准，即是教育机构人员还是政府官员。也很少有人在意学校收取的学费去向，即是由高校保管还是上缴政府机关重新拨款分配。事实上，对高校来说，保留学费可以鼓励高校扩充生源；否则若不能通过扩招增加经费来源，高校会倾向于限制性招生。

政府对公立学校的招生规范

针对政府财政紧缩，许多人会提议实行限制性招生，从而保证学生有充足的经费。虽然听起来有道理，但这种方案违背了一项经济学原理——高校会无限制扩招，直到额外招生的边际成本超过所取得的利润。政府应当规定高校最少招生额，而不是限制性招生。

无偿性资金援助

大多数国家以奖学金、公费资助等形式向一部分学生提供无偿性财政援助。这些政策很可能达不到预期目的，甚至会被某些中产阶级的学生利用。为了更有效地实行政策，无偿性资金援助应该面向真正需要资金援助

的学生或优等生。另一种方案是既考虑学生需要又兼顾学生成绩——经济困难但成绩优异的学生获得最高额度的经济援助。

学生贷款

学生贷款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很普遍。但是，许多贷款项目不能有效实行，不能取得预期效果，而且违约率偏高。为了更好地利用贷款项目，学校应当限制贷款在学费上的支出或其它费用，如生活费。在某些无法实行学生贷款的国家，另一种可行的方案是提高学费，对无法支付学费的同学实行延期缴费。

保障政策实施

财政政策通常对高校或学生有激励性作用，即激励其获取最大额度的经费。这同时导致了許多不良现象的产生，从而影响政策的实行质量。为了确保合理利用公共资金，质保政策必不可少，特别是当政府无法控制高校的运作或给予学生的经济援助仅以凭证为基础时（on a voucher basis）。因此，为了防止市场混乱，依靠私立学校（而不是依靠公共资金）的高等教育机构更需要加强政策的实施力度。

结论

总的来说，我认为如果国家政府或州立政府能坚持上述十项原则，其财政系统将有效地运作，从而更好地服务于高等教育事业。

全球性提升高校水准

Elaine El-Khawas

美国华盛顿特区乔治华盛顿大学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教育政策教授

电子邮箱: elkhawas@gwu.edu

纵观全球,为了更有效地管理大学,政府及某些国际组织都要求提升大学的领导力。这些要求反映了一项共识:在全球竞争中,一个国家必须提升其生产力,而大学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不可忽视的是,传统的大学管理方式(由学术人士决定的审议方式)已经不能响应时代的召唤。许多国家或高等教育机构都开始招贤纳士,聘用商界杰出领导人物——这些人为学校带来人脉、科研机会,甚至是竞争对手的信息。这种领导方案更有策略性和积极性。

这种重大的转变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管理层是否更有效率?他们能做出明智的决策,设定宏伟的目标,为国家的繁荣做出贡献吗?抑或是换汤不换药——仅仅是人事变动而已呢?《世界一流大学: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大学案例研究》(The Road to Academic Excellence: The Making of World-Class Research Universities)一书中指出,尽管拥有的资源和条件各不相同,这种转变对11所大学都有显著地提升。卓越的领导力会影响学校的方方面面:战略重点得以实施,学校文化转变得更为灵活并以结果为导向,稳中求进。

战略性结合

大学的发展应当与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结合。这11所学校拥有多所与外界密切

联系的研发中心、联络处和投资处,如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和韩国浦项大学(Pohang University)。为了满足校友及企业对高科技的需要,印度理工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不断通过研究和咨询加强其教育项目。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University of Ibadan)建立了企业研究与创新中心,盈利的同时还与尼日利亚石油天然气产业保持密切合作。其他大学都将学校定位为政府服务的咨询机构,如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为了扩大其全球影响力,这些大学多数采取了对外发展的战略。他们寻求国际合作机会,参加国际学术交流,规范自身学术水平使之符合国际标准。如上海交通大学为学生提供了留学、暑期海外交流及双学位等一系列项目。

学校整体性改革

强有力的领导力让这些学校不断改革创新;而传统的管理层对新的理念总是反复斟酌,缺乏行动力,或仅依靠外界而改变。这些成功的学校以学校为整体进行规划,制定长远目标。许多学校重点发展某些项目,同时限制其他项目,如新加坡国立大学。该校以绩效考核评定工资,为新雇佣的学者提供启航基金。印度理工学院也别出心裁,将学

业重心放在基础科学、数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伊巴丹大学扩招研究生的同时限制本科招生。马来西亚大学（University of Malaya）计划扩招研究生，使之超过学生总数的50%。

高效决策

改革家认为，卓越的领导层可以做出灵活并富有战略性的决定。世界银行出版的这份研究中有如下记载：墨西哥蒙特雷科技大学（Monterre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和韩国浦项大学作为私立大学，教学条件有限，但是这两所高校创造性地利用所得资源加强研究。浦项大学以其产业研究而独树一帜；蒙特雷科技大学则与当地商业社区建立关系，开发了营利性博彩；智利宗座大学（Pontifical University of Chile）认识到依靠公共财政会削弱其独立性，转而更积极地竞争研究经费。蒙特雷科技大学通过商业运作开办自己的医院和电视台，从而有效地稳固财政。俄罗斯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在上世纪末的重重困境中，突破环境局限，专攻过渡时期经济这一新的领域，寻求国际合作伙伴，从而开展了独具特色的课程。

克服障碍

明确的计划和目标帮助众多高校渡过难关。香港科技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在建校初期，意识到第一批招生质量将从根本上决定学校的声誉；因此，学校面向学生和家长抛出了橄榄枝，甚至是邀请他们座客学校。上海交通大学由于地处市区，消费成本高，学校做出决定在学校周围20公里以内建新校区；新校区成为主要教学区，拥有先进的教学设备，与

外企研发中心为邻更是增加了研究合作的机会。许多高校很难发掘优秀科研人才，主要原因是策略问题。香港科技大学向海外华人发出邀请，寻求人才。其他学校制定了吸引外国学者或合作研究的政策。墨西哥蒙特雷科技大学推出了“自我成长”项目，鼓励其员工进行博士研究学习。

系统化监管

这些成功的大学都自有一套评估体系，提高学校的运作水平。在最新的战略规划中，智利大学推出了信息管理体系对学术和行政进行监管和督促。韩国浦项大学制定了一系列绩效评价标准，每年向外界公布；同时浦项大学引进了绩效考核体系进行薪资评定。墨西哥蒙特雷科技大学设立了战略规划办公室，设定科研产量标准，甚至主动寻求鉴定机构的检查。马来西亚大学定期邀请外部评估人员或商业人士对其项目进行审度，并且制定了教工绩效考核体系，其中部分与国际学术排名相关。上海交通大学也对所有学院制定了绩效考核标准，并且与同行业学院相比较。

结语

这些高校的经验表明新的领导力量层可以提升学校运作。确立重点，克服困难，寻找一切机会达到目标；加快改革的步伐，转变角色。事实证明，新的领导层会开拓新的信息源，他们往往预设多种实行方案，甚至是突发状况的应急方案；他们虽然灵活决策，但并不与其目标背道而驰，反而会缓冲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一切都表明这些成功的高校有能力再创辉煌，为国家的发展做贡献。

作者注：本文引用了最近发表的《世界
一流大学：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大学案
例研究》(The Road to Academic Excellence:
The Making of World-Class Research

Universities)一书，由菲利普·G·阿特巴赫(P.
G. Altbach)和贾米尔·萨尔米(J. Salmi)共
同编著，世界银行出版社2011年出版，可参
考网站 <http://worldbank.org>。

混乱、商业化、“发表还是出局”

Philip G. Altbach、Brendan Rapple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Brendan Rapple: 美国波士顿学院奥尼尔图书馆馆藏发展管理员

电子邮箱: rappleb@bc.edu

最近几年, 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倍感发表学术成果的压力, 特别是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英文刊物 (如 ISI 所囊括的刊物) 上发表作品。这些刊物每年收到无数份投稿, 多数情况下只会录用其中 10% 的文章, 甚至更少。鉴于刊物数量和发表渠道有限, 市场上衍生出大量的出版机构来“接纳”这些文章。随着知识分子发表文章的需求持续增长, 聪明的商人利用信息时代时机, 预备在知识界大捞一笔。

假冒劣质期刊

不出所料, 许多投机分子也开始办起了所谓的“期刊”, 以期谋取暴利。某期刊对作者收取的交易费是 500 美元; 面对不知底细的作者, 出版商赚钱的手段不一而论。这些所谓的“期刊”名头响亮, 列出了一大堆名人作顾问编辑 (这些人对此甚至毫不知情), 鼓吹杂志通过审核, 却不能保证发表文章。很显然, 作者不能从这些杂志获取稿费, 其文章也不会被引用或阅读。许多假冒杂志都是关于科学, 特别是电脑科技杂志居多。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投稿人如何辨别杂志的真伪? 投稿人可以在杰弗里·比尔 (Jeffrey Beall) 设计的网站上查阅有公开征稿信息的

出版商 (<http://carbon.ucdenver.edu/~jbeall/Beall%27s%20List%20of%20Predatory,%20Open-Access%20Publishers%202012.pdf>)。伪学术期刊也不在少数, 如埃尔塞维尔科学出版社 (Elsevier, 一家大型国际性出版机构) 曾出版了《澳大利亚骨与关节医学杂志》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Bone and Joint Medicine)。据《科学家》 (Scientist, <http://classic.the-scientist.com/blog/display/55750/>) 杂志报道, 在 2002~2005 期间埃尔塞维尔收取了制药厂默克 (Merck) 的费用, 在杂志上发表对止痛药万络和福善美 (Vioxx and Fosamax) 有利的文章。后来埃尔塞维尔承认在 21 世纪早期, 出版社旗下的八本刊物并没有经过规范的行业审核。

与许多为了谋利而不是做学术的杂志一样, 某些“规范”的杂志或中等水平的期刊, 大量发表不该发表的文章。某些国际出版机构将这些批量发表的文章高价出售给图书馆。尽管多数期刊在原则上经过同行评议, 但是审核标准通常不高, 出版界调查力度也不够。许多学者可能会说, 有成果发表总比没有好。本世纪的一个悖论就是, 在世界顶级杂志上发表文章越来越难, 而发表的手段越来越多。

“发表还是出局” 症状

显然，“出版还是出局”这一综合症势必会受到指责。高校越来越重视文章的发表，而且往往将其与晋升、涨薪和工作保障相关；再者，用英语发表文章的要求增多，甚至是在某些不以英语为媒介的学术圈——高校行政人员认为这种方法可以提升学校的排名。出版社不断推出新的杂志，发表一些不温不火的研究作品。更有甚者，为了增加发稿量，某些作者将其研究成果拆分发表（通常毫无研究价值），而不是整合成一篇文章。但是，行政人员和出版社都乐于见此，因为一者有了作品，一者可以谋利；如此这一学术圈的游戏愈演愈烈。

杂志和知识产物成本暴涨

多数期刊定价过高。《乌利希国际期刊指南》(Ulrichsweb Global Serials Directory)收录的141000份期刊中有64000通过同行评议。显然，图书馆无法维持如此庞大的期刊更新；甚至由于费用过高，图书馆一度取消了大多数期刊的订购。多年来，期刊费用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不同领域期刊的成本亦不同(2011年化学类期刊的平均费用为4044美元，物理类为3499美元)。某些领域的期刊费用实在惊人，如《脑研究》(Brain Research)杂志每年花费24048美元，《四面体》(Tetrahedron)费用为20269美元，《物理化学快报》(Chemical Physics Letters)为17258美元——以上杂志均由埃尔塞维尔出版。约翰·威利(John Wiley)出版的期刊多数相当昂贵。2012年约翰·威利出版的《比较神经病学期刊》(Journal of Comparative Neurology)面向高校的订购价为30860美元。虽然非硬科学类杂志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但

是其价格也随成本提高而上升。《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2011年“期刊价格调查”(Periodicals Price Survey)显示文学语言类杂志在2009~2011年间成本上涨了29%，哲学宗教类上涨22%，农业、人类学及建筑学类杂志上涨17%。

图书馆面临的另一大难题是，捆绑式(bundling)订购的期刊质量参差不齐。由于捆绑式模式的限制，图书馆无法对期刊进行挑选或舍取，导致订制缺少读者群的低质量杂志。通过捆绑模式，出版社可以向图书馆出售销路不好的期刊。另一大难题是，出版社会要求图书馆签订保密协定，禁止图书馆向外界透露捆绑式订购的价格及条款。

可行的解决方案

如何解决这种期刊困境呢？有如下几种解决方案：对于质量差或价格高的期刊，学者们应当拒绝担任其责任编辑，投稿或评审。为了晋升或经费而投稿的学者可以限制性发表5~6篇研究成果，并且要注重质量而不是数量。

开放性的电子杂志也是可行方案。许多学术组织及高校创办了开放性的规范期刊，而且有知名学者的支持。《开放期刊目录》(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记载了7000多份免费的有质量保证的学术期刊。其中某些杂志久负盛名，而且有广泛的读者群，当然也有一些正在成长中的杂志。现在只是“开放式阅览”(open-access movement)的初期，如果成功，这项运动将消除学术界评估面临的经济障碍。而且，如果高校或学术组织能扩大开放度，与合法或不合法的商界出版社抗衡，学术期刊的质量将会改良，价格也会得到有效控制。

毋庸置疑，全球化和科技的发展在学术

界造成了混乱，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还有待商榷，但其势必会对学者们交流和获取报酬的方式产生影响。为学者们带来了不少问题。合理的解决方案

大学排名新方法

Robert Birnbaum

美国马里兰大学 (University of Maryland) 帕克学院高等教育名誉教授

电子邮箱: rbirnbau@umd.edu

又到了大学排名的时候, 无论是由中国或者英国, 还是其它国家的排名机构发布的最新报告都让世界各地的大学“几家欢喜几家愁”。尽管大学排名和教育水平关系不大, 但也会具有显著的经济和政治意义。榜上有名可以作为某些大学和国家夸耀的资本, 而榜单在多大程度上可信还会引起争论。一些大学为了进入榜单而采取改革措施, 虽然这些措施对教育质量的提高不会有多大帮助, 但却符合排名的标准。理性地看, 尽管一直有人坚称世界大学排名的影响力是积极的, 但是目前人们还未看到这一点, 而这种观点本身似乎只是一股学术热, 短期内看起来科学可靠并能取得一些进展, 但结果却没有什

么实质性的改变。

为了丰富原有的评级体系, 我在几年前提出了五种将教育与学术研究区分开的办法。“索斯基体系”(sausage system)中, 所有教育机构不分类别, 无论学校有多好, 或是拥有众多诺贝尔获奖者, 这一体系只进行最初排名。“乌比冈湖体系”(Lake Wobegon)提出, 应该扩大世界排名前五十名大学的候选范围, 这样就有更多大学高于平均水平。“杰里米·本萨姆体系”(Jeremy Bentham)根据满意度对大学排名。“奥林匹克体系”(Olympic system)认为, 排名应该根据强大的竞争力, 以及教师教学和学术研究的水平。最后一种是“乔治·路易斯·博格斯体系”(Jorge Luis Borges), 该体系认为, 目前已

有真实可靠的排名名单, 我们要做的就是从各种还有瑕疵的排名名单中找到那份可信的排名名单。

一些新计划

基于以上建议, 我们已经能看到一些重要的改进措施。“索斯基体系”产生的效果可能是最明显的, 这一系统的使用权最近被购买, 用于分析公共政策。举例说明, 非洲政府的“依布拉欣指数”(Ibrahim Index)是被广泛认可和极具影响力的政府评估指数。该指数基于一系列复杂的变量因素, 目前已知的因素就达89个之多, 所有因素都要经过评估, 如评估政府腐败程度、移动电话的使用情况等等, 然后将这些评估过的变量因素合成一个指数, 政府就按这一指数排名。最后的指数通过添加所有未被衡量的变量形成, 这样婴儿死亡率这一影响因子就基本和新闻自由度具有等同的影响力。非政府组织和机构把“依布拉欣指数”(Ibrahim Index)作为资源配置的指南, 而一份无关紧要的排名名单可能某天就会被用来评估学术能力。我们已经能从新的全球大学数据库(U-Multirank)排名体系看出这种可能性。这一体系由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赞助, 对从教学到知识传授的五大领域进行评价。若使用这一体系, 任何团体或者机构都能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变量, 因此, 机构可以自行决定评价标准。正如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 中的嘟嘟(Dodo)预见到参赛者在混乱的比赛之后是开始还是停止, 何时、去何地都随心所欲一样, 每个人都是赢家, 所有人都有奖励。那么, 我们的评价标准为为什么就不能灵活些呢?

“乌比冈湖体系”可能独树一帜, 认为扩大排名榜的范围明显可以产生经济效益。当人们第一次提出通过候选 100 所大学入围前 50 强时, 这听起来似乎还遥不可及。但是电影艺术与科学研究院 (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 已经开创了新局面, 最近已经增加五到十部有潜力的候选影片角逐奥斯卡年度最佳影片奖。这一改变对大学排名影响是巨大的, 正如最佳影片的候选数量没有限制, 有多少所大学能被认定为世界一流大学也是没有数量限制的。当好莱坞引领潮流的时候, 社会机构怎能落后? 事实上, 中国已经使用了经过改进的这一体系。2007年, 教育部将 80% 的大学评为优秀大学。不久, 所有大学都将被评为居于平均水平之上。

排名更利于大学发展吗?

我们应该充满期待。正如我们所知道的,

生活遵循艺术, 如果一份真实可靠的大学排名让我们看到出乎意料的影响力, 我们也不会感到吃惊。至于目前哪种在用的评价体系最好, “博格斯体系”可能更胜一筹。有一点很确定, 使用“萨姆体系”或者“奥林匹克体系”的大学排名目前还没有被足够重视。然而, 不考虑两者的实用性, 就想进行对比并加以评判似乎是痴心妄想。

最近的《2011 利雅得报告》(Riyadh Statement) 支持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尽管忽视了大学评级和机构排行榜, 该报告仍然总结道, 国家应该选择性地支持大学的发展和学术研究。对许多国家来说, 或许不该一味强调发展世界一流大学, 而应该是发展区域性大学和当地大学, 强调要按照社会需求来安排教学和课程设置。问题是, 我们要衡量的是什么, 如果鼓励很多欠发达国家投入大量资源搞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 可能就会阻碍优秀大学的存在以及公共教育设施的持续发展。世界一流研究机构的发展可以暂缓, 这只不过是优先发展和培养基础教育之后再对其进行发展。

欧洲中世纪大学之往昔与今日

Miri Rubin

英国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历史教授 (主要研究中世纪时期历史)

电子邮箱: m.e.rubin@qmul.ac.uk

作为一名中世纪史学家,我经常被问到,中世纪时期以及现在的大学之间有怎样的联系?鉴于当今世界瞬息万变,高等教育以及学生、家长、教师和教工的生活难免受到影响,这些问题变得不可忽视。中世纪时期的大学与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高校大不相同,因此很难将两者进行比较。但是,考察中世纪时期高等学府的角色,对于当代大学还是相当有意义的。

教会与王室

1150~1200年间,在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出现的高等学府是为当时的教会及王室服务的。教会和王室都需要会说拉丁语的官职人员;拉丁语作为古典语言,主要通过修辞学、逻辑学和语法等学科进行传递。毕业生(文学学士)的岗位职责主要有起草信件、合约或记账等工作。

在司法领域,教会和王室需要法律人才,要求学生取得学士学位后继续攻读法学——这与当今美国法学和医学类人才发展模式一致。为了支持这种教育模式,教皇、国王通常会允许学生或教师聚集某地,如博洛尼亚(Bologna)、巴黎、牛津和剑桥。他们免除学者的税费,允许师生自治(self-governing)。教皇认可授权的大学学位在整个欧洲都会得到认可。在基督教国家,如果想入仕或做学问,拥有学士学位是必不可少的。

中世纪概况

然而,许多用人单位无法为学生提供足够的培养资金。这些单位会免除大学的某些费用——如同现在某些教育机构享有特权一样——但是,学生仍然需要寻求经济资助。这对某些学生来说不算难事:聪明的修士有宗教组织的资助,受主教赞助的学生毕业后为其供职;许多庄园会对当地人提供赞助,条件是受助人完成学业后成为当地家庭牧师、秘书或教区教士;大多数学生需要依靠家庭、赞助或兼职来完成学业。因此,中世纪大学里辍学率相当高——毕业生人数远远少于入学人数。某些受赞助的学生一旦与赞助人关系破裂,很有可能被迫辍学。鉴于两者之间关系微妙,学生们很难顺利完成学业。如果学生必须通过借贷或乞求而继续学业,他们很可能选择辍学——白白浪费已经投资的时间和金钱。

有趣的是,那些在毕业前辍学的学生仍然可以利用学到的技能找到好职位。由于人才短缺,那些仅仅在校一两年的学生甚至很有优势。他们可以成为中世纪时期需要的教师、导师、文员或记录员——其地位不亚于当今的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和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

在中世纪时期,大学的财政与招生紧密相连。除却德国和意大利部分区域,大部分

有权有势的家庭会选择请家庭教师教育其子女。他们的继承人不需要通过接受大学教育而获得职位。而大学也不是唯一接纳培养人才的地方——大学并非应有尽有。人们可以通过行会学徒制成为外科医生，商人和公证人；也可以通过律师协会（Inns of Court）成为律师；或通过法院培训成为公务员；在作坊学习成为艺人；或是在皇家或贵族军队接受军事训练。

最后，中世纪教育的创造性——特别是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一直是被嘲讽的对象。经院哲学是一种通过辩证法研究医学或神学等学科的教育方式。辩证法被多数受过教育的人所熟知，并且可以激发深刻透彻的思考。哲学家彼得·阿贝拉尔（Peter Abelard, 1079~1142年）在巴黎（大学成立之前）用辩证法质疑上帝的存在；神学家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 约1330~1384年）质疑宗教仪式的本质及教会与王室之间的关系；圣经学者兼神学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年）在威滕伯格大学（Wittenberg University）攻击了奉行一千多年的宗教理念和宗教仪式，并彻底地进行了宗教改革。在改革和发展中，中世纪大学不仅仅培养了一大批宗教人员和公务员，更培育了激进的思想家——他们打破成规，影响了世界。

当今世界教育形势

随着欧洲、美国、印度和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如何将大学建设成培养人才、改革创新中心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在中世纪，求学的年轻人背井离乡，与同学一起接受老师指导，学习知识，了解社会。他们学习的知识具有普遍性和通识性（generic），比如分析文本、辩论观点、全面地看问题、询

问并取得解决方案等技能。他们接受的通识教育课程经历了数百年的考验，既注重口才训练又注重数学教育。与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相似，在中世纪有些学生希望毕业后为自己的祖国服务，而有些学生则选择赴海外游学，继续深造。他们掌握了理解问题、解决难题的基本技能，具备了观察世界、直面挑战的本领。

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希望终身与不同职业的人打交道，如医生、公证人、建筑师、画家、商人、士兵或绘图者。行会（guilds）、法庭、律师协会或家庭作坊传授给人谋生计或扬名立万的本领。书本知识和行会培训——二者结合方能培养出重建威斯敏斯特大教堂（Westminster Abbey）的奇才和一百年之后的诗人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等大师。

对当代社会的启迪

重新认识中世纪时期大学可能对当代社会有所启迪。或许在教育阶段，我们应该尽量减轻学生的经济负担——经济负担有可能导致学生成绩下滑，或放弃宝贵的大学学习。因为知识对学生有益，我们应该在学生入学时想尽办法减轻学费负担——如学生贷款、国家资助和慈善捐赠等方式。

另一个启发是，大学并不是培养优秀人才的唯一地方。批判性思维和沟通技能固然很重要，但是其他技能同样不可忽视——如设计、手工和工程技能等等。

知识技能的可转让性（transferability）应当是高等教育的中心。在人类的宝贵知识遗产中——文学、艺术、社会理论、自然科学和哲学等——学生们学会分析、构建、修正和补充等能力。什么才是值得学习的技能？实用主义不能衡量一切。例如，拉丁和数学

都对人的思维有益。

在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阶段，决策者、
校长和学者在规划未来时不应当忽视过去。

作者注：本文曾改编发表于《泰晤士高
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大学需要什么样的国际咨询

Philip G. Altbach、Jamil Salmi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Jamil Salmi: 世界银行 (World Bank) 高等教育主管

电子邮箱: jsalmi@worldbank.org

近来, 世界一流大学或想成为一流大学的那些学校都积极组织成立其国际顾问团队。德国海德堡大学 (Heidelberg University) 的团队由前牛津副校长领衔;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 (the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委员会由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作为主席; 一些著名沙特阿拉伯大学的委员会则由具有一流学术能力的专家和一些企业高管组成。世界各国和地区纷纷实施国家卓越计划 (National Excellence Initiatives), 包括中国、法国、德国、俄罗斯联邦、西班牙和韩国等, 这些建设计划中也常提议在学校层面建立国际顾问委员会。

这些委员会进行不定期的会晤来审查和评判机构的计划和业绩。他们会晤的目的还包括: 引进创新理念以及国际学术经验, 特别是从全球高等教育尖峰的视角, 以期帮助大学机构能了解自身、提高自身。他们时常需要为学校出谋划策, 通常都是公益性质的服务。

这些委员会也可能给大学带来额外的声望。一群受国际尊敬的杰出学者能带来光彩, 即使一个顾问团与诺贝尔奖获得者有联系, 也有很大的作用。

这些委员会通常在大学里一年见一两次, 大学的高层管理者们一般会参加他们的

会议。会议持续一两天, 常常对大学的总体业绩和计划进行探讨思考, 也包括对一个或多个项目、部门或值得详细关注的措施进行具体分析。

谁提供服务及为什么?

虽然并不是仔细而又系统的分析, 但是基于对国际顾问委员会的分析显示大部分委员会由著名的学者和大学领导人组成, 他们都是从世界一流大学中各个学科选拔出来的。这些人大多都来自于英语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大学; 他们中绝对大多数都来自于自然科学领域, 或者“硬”社会科学领域, 如经济学。人数最多的也许是来自世界一流大学的高级管理者, 比如现任或刚退休的校长、副校长、院长等。似乎很少有委员会成员是来自于中等大学或新兴的学术系统, 也很少有人来自国内大学。委员会中有时也有来自高科技领域的商界领导。资历深厚的男性委员在委员会中占据主导地位。来自大学的委员会委员通常是高级管理团队的, 如校长、教务长、副校长和院长等。

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主要为海外的同行提供服务, 帮助其他大学。许多人喜欢进行一些学术访学, 也有一些人希望能从大学或委员会的同事那里学到一些有用的经验。即

使有人愿意，也只有少数人会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这项事业上来。

利大于弊吗？

尽管国际顾问委员会不是大学财政预算的主要部分，它也涉及了相当一部分的花费。虽然委员会成员通常不会收到丰厚的报酬（除去一些特例），但是开销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直接的花费通常包括商务舱的机票和相关的旅行支出及校内接待费用。间接开销经常被粗略计算，但也不能忽略，包括大学整个高级管理团队成员花在会议上的时间、校长和高级职员准备的时间及后勤安排。一个维持两天的国际顾问委员会的会议可能需要花费十万多美元。

国际顾问委员会的特征

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不仅要效力于大学，还要对这所大学及其所面临的挑战有一定的了解。因此，必须提前将相关文献资料提供给他们，让他们在正式会议之前充分做好准备。委员会的一个优势就是它与大学有持久的关系，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可以建立信任，并促进互相了解。委员会成员也需要在主办机构获得一些一手的经验，主要可以通过与教授、学生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谈话以及与高级管理人员的交流中获得。

在国际顾问委员会会议上讨论的话题一定要相关，并且要在委员会委员的专业知识范围之内。这些政策一般会涉及大学中长期发展策略、与治理有关的提案政策、学术职业、新课程计划、国际化和其他的宏观问题。尽管有关晋升和学术评估在国际顾问委员会的专业范围内，但是具体的管理活动、人事

政策如学术人员晋升及其他管理和学术决策细节并不在委员会的专业范围内。

一定要仔细准备会议本身，要分配给每个主题足够的时间以便能有效地组织讨论。一定要避免大学管理人员做冗长的报告。要保证既能提供信息又能深入讨论，协调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

一方面参加会议的大学组织的规模要足够小，同时也要有广泛的学术人员为代表，以便能进行高效的讨论，并充分发挥顾问团的贡献和作用。同时也要积极地将高级教师和年轻教师加入讨论团队中。会议的保密性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所以慎重选择参会人员是非常重要的。

在呈现学校取得的好成绩和进步之余，大学必须愿意将自己的问题甚至危机暴露出来。不应该认为国际顾问委员会是常规式检查组织，必须将他们视作学术界的一部分。

国际顾问委员与常规的大学董事会不同。大学董事会具有法定监督责任，这往往就将大学领导和董事会成员置于对立关系中。国际顾问委员会的一个好处就是它提供了一个无威胁的平台，能公正地反馈大学的业绩，能分享相关经验来告知大学进一步的改革策略以及新项目。

结语

杰出的外来人士能带来全新的视角，帮助提高对新挑战的意识，基于其他机构获得的长期经验提供相关的建议，并以国际视野提出创新性策略。大学的管理者和知识渊博且具同情心的局外人的对话能产生有用的见地。而且，因国际顾问委员会而增加声望并没有什么不好。

关于学生流动的欧洲国家政策

林韵香

比利时布鲁塞尔学术合作协会 (Academic Cooperation Association) 项目负责人

电子邮箱: secretariat@aca-secretariat.be

20多年前,欧洲开展了如火如荼的留学奖学金项目“伊拉斯姆斯”(European Community Action Scheme for the Mobility of University Students,简称ERASMUS)。表面上看,欧洲各国似乎齐心协力地推动着国际学生流动。但是最近几年,事实表明大规模的学生流动,不论是在政策还是其实施来看,都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这种现状表明,欧洲的学生流动项目优势与劣势并存。一方面,不论是在欧盟的27个成员国还是在47个“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或“欧洲高等教育区域(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成员国,欧洲的教育事业可谓是百花齐放。因此,在制定学生流动政策时,各有各国的特色——正因为如此,各个国家可以根据其国情采取多种方案。在“欧洲高等教育区域”制定未来10年目标的基础上,欧盟计划在2020年前研究出评量各国学生流动的基准。但是,欧盟各国缺乏系统的国家政策,这就为制定实施欧洲层面的政策目标设置了绊脚石。

欧洲各种学生流动政策

欧洲的流动政策与欧盟的“伊拉斯姆斯”项目紧密相连。自从20世纪80年代设立以来,虽然饱受争议,但“伊拉斯姆斯”项目当之无愧是全球最大规模的短期学生交流项目,又指“学分流动”(credit mobility)的典范。随着“伊拉斯拉姆·蒙杜斯”(ERASMUS MUNDUS)政策的推行,流动政策开始有了多重定义,而不仅仅只包含欧盟境内学生交

流政策。现在,人们关心的是非欧洲学生怎样在欧洲获取学位,即转入型学位流动(incoming degree mobility),以及如何发展学术研究人员流动。但是,经比利时布鲁塞尔学术合作协会研究表明,与一些历史长久的“学分流动”政策相比,目前的这些新生的学生流动政策并没有引起各个国家足够的重视。

尽管许多国家非常重视学生流动,但是很少有国家制定了系统的流动政策来处理多样化的学生流动模式,多数国家没有意识到自身在政策方面的空缺。许多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如芬兰、丹麦、荷兰、爱沙利亚和立陶宛——可能仅仅制定了类似于国家层面的流动政策。多数情况下,他们缺乏完整的流动政策,仅仅在教育、科研、移民和劳工各种文件中有所涉及。比利时布鲁塞尔学术合作协会指出,学生流动政策的深度和广度在各个国家大不相同。在制定国家流动政策或目标时,有些政府甚至没有弄清楚不同流动模式的区别,比如学位型与学分型(degree versus credit)、转入型与转出型(incoming versus outgoing)的区别。

国际性流动与欧洲境内流动

到目前为止,欧洲的学分流动模式主要是在欧洲境内,而学位流动模式主要是欧洲境外的第三世界国家(即非欧洲国家)。然而,这两种模式往往都被称为国际性流动。

转出型学分流动是欧洲各国政府工作的重心。多数国家不希望学生转出流动,担心

人才流失。理所当然，虽然这种模式也存在风险，但是多数国家对转入型学位流动比较关注。一方面，吸引付费的留学生对国家的经济有益，如英国、爱尔兰、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等国便是如此。但是，某些国家也担心邻国学生入侵其国家体系，对寻求就学机会、追求高质量教育环境（如不应过度拥挤）的当地纳税人和学生构成威胁。奥地利大规模吸收德国学生的结果便是如此。然而，许多国家还是倾向于从欧洲以外国家而来的转入型学位流动，特别是博士和硕士研究生——这符合“提高创新”（enhancing innovation）和“加强知识经济”（strengthening the knowledge economy）的人才吸引战略。

流动的目标何在？

在欧洲关于学生流动的讨论中，提及了量化目标和地理中心等问题，但是它们的定义相当模糊。大家达成的一致目标是，达到20%的转出型流动和10%的转入型流动。学生流动的地理中心（包括转入和转出地），首先是欧洲（指欧洲境内），其次是亚洲，然后是美国和加拿大。

但是，欧洲的学生流动走向并不是由某一特定流动模式决定的，因此导致了模糊定义下的学生流动指标高达50%，这其中还包括了一些周期仅为一周的学术交流项目以及与学术科研无关的交流项目。除此以外，以50%流动比例为目标的国家具体要求很模糊——是要求50%的在校学生有一年出国学习的经历，还是要求在某特定时间里有50%的留学生都不甚清楚。

同样，对于地理中心的目标定位也不精确。虽然这些中心定位貌似明确，但是流动的核心学生群体到底是谁？没有清晰的参数，这些目标只会沦为政府虚无的口号，对学生流动性的发展毫无指导意义。由于细节上的模糊，比较欧洲各国的学生流动目标变得相当棘手。

为2014~2020年打好基础

欧盟即将开展一项新的项目——“全民伊拉斯姆斯”（ERASMUS for All）。与原有的“伊拉斯姆斯”项目不同，这个项目将持续至2020年，并且欧盟计划用此项目涵盖所有层次的教育，同时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特别是欧盟周边国家）。将欧洲专属（Europe only）的“伊拉斯姆斯”项目拓展至欧洲以外（包括欧洲境内的硕士生学位流动），很有可能将欧洲的“学生流动”概念复杂化。随着项目的发展，反思欧洲国家的学生流动政策很有必要。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制定出对学生流动模式有利的政策，欧洲各国应当以多种学生流动模式为基础，制定明确的目标，进行系统性的规划。

作者注：本文参考了《学术流动的欧洲国家政策：联系政策、实践和流动走势》（European and National Policies for Academic Mobility: Linking Rhetoric, Practice and Mobility Trends）一书，由伊琳娜·费伦茨（Irina Ferencz）与贝恩德·韦希特尔（Bernd Waechter）合编，德国波恩莱蒙斯（Lemmens）出版社2012年出版。

德国学生流动理念

Ulrich Teichler

德国卡塞尔大学 (University of Kassel) 高等教育国际研究中心教授

电子邮箱: mann@incher.uni-kassel.de

1986年,为了推动欧洲境内学生流动性,欧盟推出“伊拉斯姆斯”(European Community Action Scheme for the Mobility of University Students)项目。当时许多人认为这个项目不会持续很久,而且一旦项目没有起到刺激学生流动的作用或是成功,“伊拉斯姆斯”项目将即刻终止,即便成功,也将会由欧洲各个国家掌管自身的经费。

在德国,面向学生流动和年轻研究学者的公共财政主要有两个用途——资助转入型和转出型(inwards and outwards mobility)博士生流动,以及资助在德国求学的发展中国家学生。

最开始,“伊拉斯姆斯”项目在德国反响欠佳。德国政府认为这个项目是欧盟对其国家政策的干涉。“伊拉斯姆斯”项目的学分制(始于1989年)不能完美地匹配欧洲各国不同的教育及考试政策。研究表明,德国大学教授并不认同将国外留学与国内学习划等号的做法。

这种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了转变。德国成为欧洲掌控学生流动、制定博士硕士政策的主要成员国之一。2005年左右,德国计划在2020年之前使留学生数量占到学生总数的20%。

有关国际留学生的数据表明,几十年间,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例,德国的留学生一直高于欧洲各国留学生平均值。德国学生出国留学的比例也比其他经济发达国家高。德国未来也势必将保持这种趋势——这一点及其各种教育支出和经费的政策等已经

受到广泛认可。

借鉴“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

1999年在《博洛尼亚宣言》(The Bologna Declaration)中,众多欧洲国家的高等教育部长提议,制定博士和硕士学位框架。这项提议为吸引海外留学生、提升欧洲境内学生流动性提供了指导意义。

然而,学术合作协会(Academic Cooperation Association)2006年和2011年在“欧洲数据库和流动地图”(EURODATA and Mapping Mobility)的研究中指出,目前没有有效的数据来衡量其成果。大多数国家以国籍而不是流动性来衡量。但是,有确切的数据表明欧洲25%的留学生在就学前有在留学国生活过的经历,10%的“留学生”实际上并非外国人,而是回国学子。一些国际数据采集机构,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欧洲共同体统计局(Eurostat)甚至没有将短期流动计算在内。关于博士生的国际数据同样不可靠。最近,许多欧洲国家开始彻底而真实地进行流动统计,虽然此类统计仍不完善。

上文中提到的“流动地图”(Mapping Mobility)用以下数据来衡量博洛尼亚进程的影响。欧洲留学生(欧洲境外)数量的绝对值在八年内翻了一番;欧洲境内的学生流动稍有上涨,但不确定是否与“博洛尼亚进程”有关。毕业生调查表明,不同国家中有海外留学经历学生所占比例大不相同——从2%

至30%都有。德国的学生流动在以上方面都有增长。从其他欧洲国家转入的学生流动所占比例从1999年的3.2%增长至2009年的4.5%，非欧洲国家学生流动比例从2.8%增长至4.4%，本土学生出国比例从2.8%增长至5.4%。超过15%的德国毕业生有过留学经历。

关于欧洲境内学生流动的结构性和功能性变化有很多研究。在某些国家，由于学生们认为短期内在海外获得有价值有意义的学习很难，因此短期出国留学的比例稍有下降。除此之外，出国攻读硕士学位的学生增多。最终，在国际职业市场上，有过海外留学经历的学生与本土学生之间的区别正日益减少——很可能是受全球国际化和国内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影响。因此，流动的价值需要重新定义。

政策反响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欧洲各国政府以及利益相关者继续提倡推进学生流动进程，但并不改变其模式。但是，接纳转入型学术流动学生，特别是非欧洲境内学生，所需成本不断增加——这个问题备受关注。有些国家对非欧洲境内学生开始实行或准备实行收费政策。有些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正在考虑减少财政投入，转变对留学生的政策。

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最

近发布了一系列关于未来教育研究的草案。对流动学生和青年学者的财政投入将有所增加。“伊拉斯姆斯”将更名为“全民伊拉斯姆斯”（ERASMUS for all），继续担当欧洲高等教育政策的旗帜。洲际财政投入也会有所增加。对于青年学者，将增加博士学位流动性。最后，为在欧洲其他国家攻读硕士学位的学生提供贷款项目。

增加教育与科学发展方面的财政投入相当于“投资未来”（investment into the future）——这一观念在德国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其中，并不存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争。在德国，职业培训的花费大部分由雇主支付，高级职业培训由学员自费承担，高等教育经费由公共财政支付。这种成本投入和盈利方式无可厚非。

与此类似，德国面向学生的发展资助模式也无可挑剔，对于不同学生该享有怎样的待遇、怎样处理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学生、怎样对待普通学生和进行博士研究的学生等问题都有所考虑。这些资助模式可以理解成为慈善、经济投资或预防国际危机等。在某些非欧洲国家中，有一等本土（或欧洲）学生与其他需要支付高昂学费的二等学生之分；而德国没有此类政策。总之，德国在这些方面无需做出政策改变。

投资领导力发展：英国经验谈

Robin Middlehurst

英国伦敦金斯顿大学（Kingston University）高等教育学教授，战略、研究和国际领导基金会（Strategy,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Foundation）主任

电子邮箱：r.middlehurst@kingston.ac.uk

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均被视为经济增长、再生以及社会福祉、和谐的核心。高等教育也因其跨国教育和全球研究创新网络方面的扩张作用而与全球化的蔓延密切相关。在全球地位和声誉的竞争中，国家竞争力的议程体现在各机构和高等教育系统之间的竞争。

在这种环境中运营的教育机构，其体系已经变得庞大、复杂，业务范围越发集中。以位于英国同一城市的两所大学为例：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现有学生40000名，包括来自180个国家的7400名国际学生；教职工数达9755名，是西北地区最大的雇主之一，每年对该地区的财政影响据称达14亿英镑。相较之下，更年轻的曼彻斯特城市大学（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有34000名学生，包括来自109个国家的2800名国际学生；教职工数为4300名，每年对该地区的财政影响据称为6.9亿英镑。经营这样的组织，需要广泛的技能和丰富的经验——它既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成功企业，又是地方和区域的发展引擎，更是世界一流的学术机构。同时，还需要新的管理结构和工作实践，以建立起学术带头人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合作。欧盟委员会在其关于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公报（2006年、2011年）上承认了这一点，该公报支持在专业管理方面进行重组并加大投资。

这样的议程对于英国来说并不新鲜，因为历届政府都曾对大学施压，要求其收入来源多元化、运行更加高效并能为公共政策目标做出广泛的贡献。作为回应，教育机构已经建立起了行政管理结构；发展了高层管理团队；减少了委员会的决策；增加了院系领导的预算和员工管理职责；并加强了对各级的领导（尽管在英国各地的165所大学和院校之间会存在不同的联合领导和管理方式）。如今，从院长到副校长（校长）的高级学术带头人通常都是选拔上岗，并签订固定期限或永久管理合同；且在管理准备和发展工作上的参与程度越发成为领导岗位选拔标准之一。

校长支持领导力发展

2003年，校长们表示投票赞成成立由高等教育机构自身管理的“高等教育领导基金会”（Leadership Foundation for Higher Education），大力推动了高层领导力发展。政府划拨的1000万英镑现仅占其收入的20%；其余的收入来自项目收费和会费（近90%的英国院校已自愿入会）。该基金会向各级领导提供一系列基于英国本土和国际层面的项目、针对新晋管理者和有经验的管理者的项目、为领导者和管理者提供专业网络、专题领导技能发展会议及活动、量身定制的内部管理方案、个别辅导、有效管治的审计、高

层团队发展,以及更广泛的组织变革措施(如建立“变革学院”,为致力于机构变革方案的跨职能团队服务)。该基金会也通过委托研究领导力事宜、为机构创造管理资源,以及为机构和跨机构举措提供可观的发展补助等方式向部门注资。值得注意的是,这项覆盖面广泛的国家级项目并未减少教育机构的努力。据报道,在2000年,70%的高等教育机构高层领导几乎没有接受过正式的发展培训;而到2010年,73%的高等教育机构表示系统的领导力和管理开发项目已经就绪。另外,90%的受访学者认为这些领导力发展项目有利于自身的职业生涯。

如今的发展格局需要与各种的机构需求和个人职业生涯轨迹相匹配。英国高等教育的独特之处包括:领导者和管理者拥有广泛的学科和专业经验;学者和专业工作人员之间的角色界限越来越模糊;很多来自商业、医疗保健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级管理人员进入教育部门。随着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日益多样化,跨文化的技能和理解日益重要。为了作好准备,院系领导和职业经理人会在经营管理和有关高等教育管理的科学计划上协调工作,而潜在的首席运营官和首席执行官则共同致力于高层管理人员计划。对战略领导力的培养吸引了那些希望将自身技能和领导潜力与其他人进行对照的学者。校长则享有专属的机会,如个别辅导;与其董事会主席的配对计划;或密集型的转型训练项目,包括个人转型、机构转型以及制度层面转型等。内部培训项目同样重要,它包括针对一

所大学中100名高级领导者和管理人员的队列方案(cohort programs)、高层团队建设的专门重点方案,以及有针对性地发展研究小组新领导干部的举措。

国际机遇包括结对方案(twinning programs)、政策导向型的考察访问以及面向其他国家领导人和部门官员的战略领导力计划。这些项目旨在实现个人、机构以及英国和海外高等教育部门之间的互惠互利;它们还可以惠及当地社区并影响地区间的高等教育业务联系。大学的国际化发展战略为创造性地发展领导力提供了机会——在教学、科研和企业领域推动更为广泛的国际伙伴关系。

经验教训

虽然一个动态多变的高等教育格局需要持续的创新,但是从三十年的经验中总结的一些教训可能会持续受用。第一,领导力发展需要根据日常管理议程进行调整,以保证其相关性和及时性;第二,领导力发展应该挑战理论和实践,并为讨论和实验提供支持和安全的空间;第三,如果目标是要进行实质性的变革,那么,个人、团队和部门层级则需要以“全系统”(whole-systems)的经营理念考量领导力发展。第四,如果进行战略性的设计,领导力发展所能提供的会远远多于个人准备及发展:通过国内和国际的合作伙伴关系,领导力发展可以为发展学术业务提供一个渠道。

全球化下管理和领导非洲大学

Pius Coxwell Achanga

乌干达国家高等教育理事会 (the National 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质量保证部

电子邮箱: pius_achanga@yahoo.com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 非洲高校的领导者迫切需要了解大学运营的重要方面。在 21 世纪, 大学的管理和领导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些挑战之所以巨大, 在于其复杂性, 如预算庞大的多层次机构 (multifaceted institutions) 以及跨境教育 (cross-border education) 所带来的影响等。本文表明, 作为先决条件, 非洲的大学领导者需要先接受有关大学治理的培训。在 1960 年, 非洲只有 20 所大学。如今, 非洲有超过 500 所大学 (包括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大学数量上的骤然暴增归咎于若干个因素, 比如中等教育的普及化以及视高等教育为有利可图的可行性商品的看法。然而, 随着大学数量的增加, 高层次需求也随之产生, 即领导者需要具备管理这些大学的良好领导力。

领导力的挑战

在大多数非洲国家, 大学管理层和领导层的选拔基于学术成就和政府认可。在多数国家, 大学的高层领导 (如校长和副校长) 因其知名学者的身份而获得任职资格。尽管这种现象可能被认为具有积极的意义, 但在现实中, 让未来的大学领导们参与培训, 使他们能够应对相关的挑战是有必要的。在乌干达, 很少有校长参加严格的领导和管理培训项目, 也很少有立足于非洲本地语境的培训项目。可是, 非洲大多数的大学校长正面临着众多的行政和人力资源挑战。

私营机构的出现

在这种背景下, 非洲出现了面向大学教育的新型供应商——“私营机构”。私立大学越来越多, 引发了一些问题, 因为多数这样的大学没法提供优质的教育。此外, 它们还遭遇了巨大的困难——有时刚获批即被迫停止运营 (参见 2010 年 5 月 21 日乌干达报纸《箴言报》[Monitor] 关于鲁咖兹大学 [Lugazi University] 关闭的报道)。相反地, 在许多情况下, 私营机构中的校长并非因为是优秀的学者而被选派, 而是因为他们拥有部分机构的所有权 (发起人或董事会成员)。因为私立大学中受托的管理者可能缺乏运营如此级别机构的基本知识, 所以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由此导致问题频发, 如教学水平差等。

未来的发展

作为乌干达高等教育机构的托管部门, 国家高等教育委员会展开了一项为期三年的“管理和领导培训项目” (The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Training Program) 试点方案, 以支持乌干达各大学的新兴领导者。该管理和领导培训计划由美国纽约卡内基公司 (the 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 赞助, 旨在培养 150 名新兴大学领导者的高等教育管理的关键技能。

根据一项需求评估, 该培训计划开发了九个模块。第一个模块为“全球化视野下的

非洲教育”，介绍全球化的概念及其他相关因素，如国际化和跨境教育。第二个模块是“领导、制度创新和发展”，涵盖的主题为大学领导力，该主题被视为推动教育机构实现理想目标的关键杠杆。第三个模块题为“大学的企业治理”，旨在对大学所面临的公司治理问题有更深入了解。第四个模块是“高校资源的管理”，旨在向大学管理者传授有关资源获取与管理知识。第五个模块是“学术过程的管理”，着眼于大学中所提供的学术课程发展。第六个模块处理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并阐明大学在重塑国家经济格局上扮演关键角色的观点。这一模块的选择基于如下前提，即参与者（学员）享有选择最终模块的机会。模块开发的这一理念会在各个培训课程中予以落实，并经由精心挑选的、具有良好课程开发知识的模块撰写人员予以完善。第七、第八和第九个模块采取类似的策略，但预计会将困扰整个高等教育的各种战略问题具体化（思考与规划）。

为了能将可信赖的行动者吸引到这个项目来，管理和领导培训团队执行了密集的参与者选拔流程。该选拔流程通过在大学召开初步研讨会来确定可能的领导人选，且这些候选人承诺将致力于三年的培训计划并服务于高等教育体系。管理和领导培训团队采取了让各大学直接参与遴选过程的宣传战略，取得了出色成果。该计划在培训开始之前就为管理和领导培训团队以及大学提供了一个解释问题并处理焦虑及潜在问题的极好机会。该项目任命现任和前任校长为教练。他们不会参与项目讲授（lecturing），而是扮演

促进者（facilitator）的角色。该项目也同时也在欧洲大学的领导和管理层中发展了一批培训辅导员。作为培训的一部分，参与者则需要为其所在学校提供改革方案。目前，乌干达有12所（公立和私立）大学正在推进该项目，由总部位于南非斯泰伦博斯（Stellenbosch）的评价研究机构（Evaluation Research Agency）对此进行监控。

迄今的结果

三组中高层管理者和领导者团队已经接受了培训，他们来自参与该项目的一些大学。在每一次的培训中，学员们都对该项目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对修正自身的世界观、学习新鲜事物抱有开放的心态。在各自大学实施改革方案的渴望预示其方案会获得巨大成功。参与者已经能够证明他们具备了辨别高等教育中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及其相互关系的能力。此外，参与者表现出了良好的分析评估水平，并能确定战略规划，以辅助工作进展。

结论

国家不断寻求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知识，因此非洲大学的数量将继续增加。对新兴大学的管理和领导面临着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重挑战。责任落在了高校领导者身上，他们自己要做好准备。采取创新的举措——如由卡内基赞助的“管理和领导培训项目”，可以推进潜在的领导者们落实改革进程，为大学毕业生们——即国家未来的领导者树立领导风格。

国际化新纪元下非洲的合作关系发展

Damtew Teferras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所非洲高等教育国际网络研究中心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on Higher Education in Africa) 主任

电子邮箱: teferra@bc.edu

在复兴非洲高等教育的过程中,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是最受欢迎的途径之一。“合作伙伴关系”(Partnership) 现已成为流行语。确实, 由于历史和发展路径的原因, 非洲高等教育一直都属于国际事务。因此这样的发展可能并不令人意外。本文将联系历史和现实, 分析非洲高等教育合作关系的发展趋势、挑战和机遇。

高等教育合作的市场环境

曾经人们认为, 冷战各参与国之间停止敌对行为之后, 非洲对世界的吸引力会下降。但这一预言错了。在过去的20年中, 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发展促使非洲国家与历史伙伴和一些新兴国家再次合作。

作为全球化发展的一部分, 非洲地区的高等教育重新获得了世界其他地区的注意, 如欧盟、美国、加拿大、中国、印度和巴西。本文将简要介绍非洲和这些地区的合作关系。

非洲——美国高等教育合作发展。2007年7月, 美国和非洲的一些高校联合启动了一场旨在增强非洲高等教育能力、促进优先发展领域发展的合作运动。2010年美国“综合拨款法案”(Omnibus Appropriations Act) 为该运动贡献了1500万美元拨款 (<http://www.aplu.org>)。

加拿大——非洲高等教育合作发展。非

洲大学联盟 (The Association of African Universities) 与加拿大高校联盟 (the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of Canada) 合作启动了“巩固非洲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关系”(Strengthening Higher Education Stakeholder Relations in Africa) 行动。该计划包含三个内容: 扩大非洲大学的服务范围, 促进校企合作, 以及通过非洲大学联盟与加拿大高校联盟的合作巩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http://www.aau.org>)

南非——北欧高等教育合作发展。来自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的25所研究型大学与来自马拉维、南非和赞比亚的大学共同建立了“南非——北欧中心”(the Southern African-Nordic Centre) 合作关系。这一合作关系旨在促进北欧国家和南非地区在学术上开展多边合作, 迎接创新和发展的挑战。 (<http://sanord.uwc.ac.za>)

欧盟——非盟高等教育合作发展。欧盟委员会和非盟委员会正通过一些不同的计划结成伙伴关系, 以激励非洲的高等教育的发展。这些计划包括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地区交流项目 (Intra-ACP Mobility Scheme, 现被称为尼雷尔综合奖学金项目 Nyrere Consolidated Scholarship Program)、协调和调整项目 (Harmonization and Tuning Project) 以及泛非大学倡议 (PanAfrican University Initiative)。

与北欧地区的高等教育合作。欧洲斯堪的纳维亚地区(Scandinavian Region)大学和非洲大学的合作可能是持续时间最长、成效最显著的。特别是在挪威和瑞典,两国已经承诺在未来几十年里投入大量资金支持非洲大学,即使到那时对非洲高等教育的支持已不再是热点问题,支持仍会继续。2010年11月,挪威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召开了有关高等教育支持的全国性研讨会,据悉挪威发展合作署(the Norwegia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为该合作投入了超过7.5亿挪威克朗(约1.3亿美元)。

德国学术交换服务。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又称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 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 Dienst)已经投身非洲大学合作超过20年了。现在,与非洲大学有合作关系的大学已经超过35所。此外,新建的与非洲大学有合作关系的五所非洲研究所和五个国际研究中心也获得了支持。新的合作方式让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德国大学协会(the Germ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和一些大学协会以及高等教育管理者合作发展质量保障体系成为可能。
(<http://www.daad.de>)

历史伙伴

出于不同的目的和兴趣,非洲和其历史伙伴之间建立起了无数的大学合作关系,包括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和研究发展合作计划(the Austrian Partnership Program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for Development)、比利时发展中国家大学合作(the University Commission for Cooperation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爱尔兰——非洲研究能力建设合作(the Irish African Partnership for Research Capacity Building)、荷兰国际高等教育合作

组织(the Netherlands Organiz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以及英国的非洲教育伙伴计划(the United Kingdom's Education Partnerships for Africa)。

新兴伙伴

新兴的政治经济大国,如巴西、中国和印度,都很重视支持大学发展,也很重视在非洲的能力建设。俄罗斯和前东欧集团国家在从这一地区的教育领域撤出20年后,也返身积极参与其中。南非作为这一地区的动力,也正努力发展与其他非洲国家建立大学合作关系。

作为能力建设的国际化进程

合作在教学和研究能力建设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联合研究活动对打造研究能力、培养研究文化、推动知识前沿以及达到质量目标都非常重要。精心发展的长期联合研究伙伴关系已经结出了成功的果实。

例如,由瑞典国际发展署(the 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和比利时弗兰德大学校际委员会——大学发展合作项目(the Flemish Interuniversity Council - University Development Cooperation)共同支持的与埃塞俄比亚大学间的合作硕果累累:培养了大批博士生,发展了无数的教育项目,建立起了可持续的发展能力。挪威发展合作署支持下的坦桑尼亚也是这样。许多人认为,如果合作双方没有财政、后勤与人力资源的长期联合承诺,要想获得这些成果简直是不可能的。

培优除劣

当谈到大学合作背景下的能力建设时,人们一般认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者是主

要的受益人。这一观点也被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合作者内化了。然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者所获的收益并没有清楚明白地写在文件上，而且发达国家的合作者也有许多途径从中获益。

尽管发达国家并不关注短期、可见的效益，但是学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无疑也成為了这些大学和国家的知识资本。在当前的形势下——全球即是本土、本土即是全球（the global is local and the local is global），绝不能低估或者忽视这些合作关系中的共同收益。

尽管高等教育合作的模式和范畴多样、复杂、繁多，但这些合作也并不总是成功有效的。很多时候合作关系并不能如愿以偿，其中有诸多原因，包括：资金少，后勤支持不足，规划不佳，执行力低下，政策不得力，方针冗长，领导层不稳定，合作没有连续性等。

结论

随着高等教育成为重要的发展工具，如

今多边和双边政权、基金会和其他发展伙伴都热衷于支持高等教育发展，虽然最新的《非洲委员会报告（2010）》（African Commission Report）对此仍欠缺关注。然而，竞争性捐赠驱动计划的流行、可持续性的缺乏、捐赠资源的不可预见性、融合问题，以及协调和管理的薄弱等，都妨碍了这一趋势进一步的发展。

随着大学合作数量的增加，合作可能对大学资源（时间、资金和基础设施）和大学活力（凝聚力、互补性和优先事项）造成很大的影响。如果一所大学本身的合作潜力不足，但却身处倾向于吸引更多发展支持的地区，那么这些资源因素的影响就会特别显著。

最后，由南、北半球见多识广、负责任并且务实的利益相关者引领发展非洲大学合作伙伴关系是势在必行的。在合作中获得有持续影响和意义的成果，符合合作双方利益相关者的最大利益。

扩大加纳和坦桑尼亚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Louise Morley

英国塞萨克斯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Sussex) 高等教育与公平研究中心 (the Centre for Higher Education and Equity Research) 教授

电子邮箱: L.Morley@sussex.ac.uk

人们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扩大入学机会的政策是否奏效存疑。这正是名为《扩大加纳和坦桑尼亚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发展平等记分卡》(Widening Particip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 Ghana and Tanzania: Developing an Equity Scorecard) 的研究项目要回答的问题之一。来自英国塞萨克斯大学、加纳海岸角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Cape Coast) 以及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Dares Salaam) 的研究团队发现, 政策促进了高等教育学生数量的提高, 特别是女性学生。但是, 研究团队也发现加纳和坦桑尼亚的许多教育项目中仍然看不见贫困学生和成年学生的身影。研究中涉及的大学的确招收来自较差背景的学生, 但他们的招收数量不多, 或者根本无法控制贫困学生入学和完成学业的数量。那些成功入学的学生和研究人员分享了他们的个人经历。

学生的声音

该研究计划对 200 个学生就他们的小学、中学和大学经历进行生活历史访谈, 询问他们的学习动机、转型、支持、决策、对高等教育的第一印象、高等教育对他们的影响以及他们未来的计划等问题。参与讨论的学生们背景多样, 一些来自那些代表性不足的群体, 如女性、成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和残疾人。他们讨论了进入大学和在大

学学习的经历。许多学生, 特别是那些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背景的学生反映, 他们的入学机会全仰仗贷款和助学金。成年的学生则反映学习期间养家糊口的压力很大。

有证据表明, 两国的许多高等教育工作者和学生感谢教师、导师以及辅导员给予他们的帮助。然而, 也有很多人抱怨教学质量低, 图书馆和信息技术等学习资源和设施缺乏。残疾学生尤其受质量低劣且常常不可用的设施之苦。许多学生反映了大班教学以及教室拥挤的问题, 希望减少大规模宣讲式课程, 增加互动和参与的教学法。

考试受到许多人的关注。不仅因为考试维系着大量的悲喜, 还因为许多学生觉得考试过程常常不稳定, 且缺少透明度。人们一致认为, 教师对提高质量似乎没有责任感, 对评分和课程内容也常常做出偏颇、拖沓且没有连贯性的决定。

男女不平等

许多女学生注意到了高等教育对改变自身境遇的潜力以及高等教育的实用性, 如保证自身经济独立、获得职业身份和地位。然而, 尽管本科生中女学生的数量正在上升, 入学后的女学生仍然面对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歧视的诸多问题。两国的师生都谈到了性骚扰, 特别是一些男教师要求女学生以身体交换分数的问题。这损害了女学生的身心健康,

也让她们打消了向男教师寻求帮助以及在课堂上发言的念头。

女学生们也讲述了来自男学生的压力，既有性别差异问题也有社会上的压力问题。男性将女学生在家做饭洗衣等劳动都当作理所当然需要完成的任务。这使得女性不能专注于学业，也限制了她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交男朋友是正常的，而那些不屈从于这种压力的女学生则受到污蔑或被边缘化。

“成为某人”

除了对教育质量和安全的高度关注，学生们一般都认为高等教育改变了他们的社会身份并激发了他们的发展潜力。对很多人来说，高等教育是让他们“成为某人”(become a somebody)、出人头地的方法。他们说，成为大学生使他们提高了自我效能和自尊，许多人希望运用他们新建立的社会资本和聪明才智促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其他人只希望拥有“好生活”，逃离农村和城市的贫困。他们对成功的渴望抵消了所有负面经历，他们相信毕业就意味着生活有了保障。而且，许多人希望继续攻读研究生。

事半功倍

对200名教师和政策制定者的访问中，受访者常常强调能力面临的挑战以及引入扩大入学机会政策的过程。他们广泛谈到贫困对学生入学机会的影响以及贷款体制对贫困学生入学和成功完成学业的关键作用。他们建议，《全民教育政策和千禧年发展目标》(Education for All Policies and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需要与高等教育结合的更紧密。目前为止，所有对社会地位较低学生扶持的政策重点都仍然还在基础教育，而不是高等教育。

女性学生数量的增加，特别是在自然科学学科中，非常显著。许多受访者认为，这应该归结于国际捐赠者的积极影响。然而，许多人注意到仍缺乏有效的数据和管理信息系统，这些系统本可以使他们控制和评估不同背景学生的入学、毕业和成绩情况。

描绘教育公平

该研究的一大特色在于，研究不仅进行了访谈，还搜集了统计数据。100份“平等记分卡”(equity scorecards)统计了四个专业的学生入学、保留、完成学业和成就的一手数据，涉及平等问题的三个结构性因素，即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和年龄。统计数据显示了性别、年龄和社会经济地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同时还反映出与访谈数据中相互矛盾的部分。多数专业只招收很少的或完全不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学生。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学生也只是在一些人力市场需求较低的专业中心学习。然而，来自较低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一旦就学，其辍学比例很低，并且学习表现往往与其他同学不相上下，有时甚至更好。最容易辍学的学生是成年学生。女性，尤其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成年女性，在科学专业中仍然是弱势群体。更多女性就读于私立而非公立大学。

这一研究计划说明了贫困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负面影响。研究发现，不平等的知识地理分布以及高等教育入学的陈旧模式仍然存在于加纳和坦桑尼亚两国。从全球来看，高等教育入学率在不断上升，但不是所有人群都一致。对许多人而言，扩大入学机会与一个特定群体就读科学专业的数量变化有关，这一群体常常是女性。针对已入学学生的经历、保留率和学业完成率或针对社会身份融合的政策仍然较少。本研究提出了教育

质量和公平需要通盘考虑的问题，还提出了高等教育怎样在财富分配、消除贫困和创造财富上体现价值的问题。

作者注：更多详细的信息请见相关网站
<http://www.sussex.ac.uk/education/cheer/wpheg>。

商界想从高等教育获得什么：印度一瞥

Daniel c. Levy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特聘教授

电子邮箱: dlevy@albany.edu

2011年11月,自称“印度工业政策改革先声”的印度工商联合会 (the Federation of Indian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主持了关于印度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大型会议。参会者众多,并不仅限于那些关注商业利益和私立高等教育的人。印度工商联合会发表了商业界对印度高等教育未来政策议程的基本观点。

印度工商联合会的主要原则与一年前在菲律宾召开的以商业为目的高等教育研讨会上发表的原则很相似。印度工商联合会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商业发展。这种视角很可能带有自由主义现代化的特点——常被称为新自由主义 (neoliberal), 并提出了一份有关高等教育成长性、私立高等教育优先关注点、学术现代化以及限制政府管制的议程。

成长性

商业界似乎和公众一样渴望印度高等教育快速扩招。事实上,高等教育扩招数量已经很高,现在在校生已经达到1460万。不过,毛入学率仍然只有13.8%,高于2000年的10%,但仍远远低于中国。印度工商联合会希望政府在2020年将毛入学率提高到30%,这样对高等教育的未来需求将大大超出现有的教育供给。但印度工商联合会并不认为这样的要求过分,也不认为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就是对有害于经济和学术的政治压力的屈从。

相反,印度工商联合会认为未来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剧增对于知识经济、国家发展和商业利益都是必要的。这一成长必须突出强调高质量的研究生教育和科学研究。印度工商联合会哀叹高等教育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如基础设施差等。最重要的问题还包括缺乏足量受过培训的教师,目前的教师量甚至连现有学生的需求也满足不了。

私立高等教育

尽管印度工商联合会的成长性论点包含了公共和私立高等教育两方面,私立高等教育仍然获得了更多的关注。不同数据显示,私立高等教育中在校生比重约为全部入学率的30%。当然,对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国家而言,在公共高等教育史无前例快速成长的背景下,私立高等教育维持比例或扩张比例的能力都非常可观。

私立高等教育特征的变化由很多因素引起,例如私立高等教育缺乏集中规划、快速扩张、院校类型多样以及院校分类制度的问题等。“优秀大学”(Deemed University,印度的一类由政府 and 高校资助委员会认定的自治大学)、职业院校、商业集团(如玛尼帕尔教育集团 [Manipal Education Group])、不受政府资助的私立大学、远程教育以及各种国际合作办学都是含有私立高等教育成分的高等教育形式。私立高等教育最富戏剧性的成长背景是

专业应用领域,如工程和管理方面。“优秀大学”主要是一些私立大学。与公立大学相比,国际合作办学的发展在私立高校中更普遍。与此同时,不受政府资助的私立大学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印度工商联合会极力推动私立高等教育发展各种院校类型。印度工商联合会明确宣称赞成现有高校发展和创建新的院校,尤其乐见印度各州立法机构建立的“州立私立大学”(state private universities)的扩张。主要原因是其欣赏这类大学的自治和灵活性。印度工商联合会对相关增长率非常关注:过去五年新建了94%的州立私立大学。

学术现代化

商业对私立和公立高等教育领域都有所求。其中,更高的学术质量、与就业市场更紧密的联系以及国际化是最重要的几点。公立高等教育中的商业变革可以被视为部分私有化(partial privatization)。部分私有化进程由于受商业利益驱使,直接介入了私立高等教育,由此介入了私立和公立高等教育的交叉地带。例如,印度工商联合会呼吁向“以学生为主的筹资”(student-side funding)前进,以拉平市场竞争者之间的差距。政府的高等教育拨款一直都更多地发放给公立院校。

印度工商联合会也很关注许多私立大学低劣的学术质量,并把它们称为“需求吸收型”(demand-absorbing)高校。他们也看到了高校规模的惊人扩张,与2001年的11146所高校相比现在有31324所院校。另一方面,印度工商联合会最关注的是私立高等教育的上端,又称“半精英型”(semi-elite)高校。当然,印度商业界响应世界潮流,继续发展并

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而这些学校将来可能比现有的世界一流大学更好,其中既会有私立大学也会有公立大学。

政府管制

印度工商联合会疲于澄清商业并不是反政府管制。政府的立法目标应该针对质量低下和造假的真问题。增加透明度和有助于学生的法律法规都是受欢迎的。商界也希望保护和促进私立高等教育发展,但并不想印度高等教育这锅“粥”里混进“老鼠屎”。

然而,印度工商联合会对政府管制的立场仍然是受限制的。但悲哀的现实却是“管理者和规矩都太多”。这些管制破坏了大学自主选择、自我管理必须具备的自治权。因此,私立高等教育在受到过分管制的同时治理得又未尽如人意。针对商界对政府管制私立部门的批评,印度工商联合会声称对投入的管制可能有些过头,例如学校必须配备计算机实验室的要求与学生自备笔记本电脑的现实相冲突。对投入的管制减缓了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创新和多样化。

可能是出于政治的考虑,印度工商联合会只是抱怨政府对印度整个高等教育的过度管制。然而,许多私立院校的所有者却认为,政府敌视私立部门并处处针对它们。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议会的《不公平行为法案》(Unfair Practices bill)。印度工商联合会还指望政府加强对外国教育提供者和营利性教育提供者的管制,2007年曾提交一份法案但至今没有通过。商业界将这些管制都视为破坏增长、私人投资和竞争的管制。

作者注: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

分校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私立高等教育研究计划” (the Program for Research on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资助, 美国波士顿学院的《国际高等教育》(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每期安排了一个相关的专栏。参见 <http://www.albany.edu/>。

寺庙与世界一流大学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印度寺庙或其他任何地方发现 220 亿美元深埋地下的新闻并不寻常。既然位于印度喀拉拉邦 (Kerala) 的都会城市特里凡得琅 (Thiruvananthapuram) 的寺庙 (Sree Padmanabhaswamy Temple) 得到了这笔意外之财, 每个人都在就资金的使用提建议。本文旨在提出可行性建议, 为印度和喀拉拉邦作出实际贡献。提出的建议也和印度政府发展文化、科学和文明使命相契合, 为印度建立第一所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服务。

尽管印度的经济快速发展并拥有悠久和卓越的知识传统, 却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现有的大学中没有一所位于排行榜前列, 也没有一所可以称得上是全球顶尖大学。只有印度理工学院 (the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和印度管理学院 (the Indian Institutes of Management) 非常著名, 但它们不是大学。建立一所世界一流大学不会花掉所有挖到的这笔钱。当然, 所有具有宗教或历史价值的物品也需要保留到一所与大学有关的博物馆里。2 亿美元 (大约 900 卢比) 可以被用于在前特拉凡科皇族王国座下的特里凡得琅建立一个顶级校园。80 亿美元 (大约 2500 卢比) 作为基金, 通过运营每年拿出约 5.6 亿美元 (即 70% 左右) 的资金负担大学的运行。剩下超过一半的钱可以存着或用于其他目的。

建立斯里帕德玛纳巴史瓦米神大学

(Sree Padmanabhaswamy Univeristy) 可以一次达成多个重要目的。一所世界一流大学能为印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提供一个高等教育典范。这所大学也可以为喀拉拉邦的经济和关键领域进行跨越式发展做贡献, 如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等。

喀拉拉邦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理想地点。该邦自称“上帝的祖国”, 寓意祥瑞。此处环境宜人, 满目葱茏, 基础设施一流, 当地社会也没有印度其他地方那么紧张, 通过海湾, 喀拉拉邦与世界其他地方交通顺畅。喀拉拉邦的文化普及率高, 年轻人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 18%, 是印度平均水平的 2 倍。

喀拉拉的世界一流大学会是何面貌?

财政是一所顶级大学发展的基础。斯里帕德玛纳巴史瓦米神大学的每一方面都不带有印度色彩。它可以既不是一所公立大学, 也不是一所私立大学, 而是一所独立的大学, 由与寺庙和喀拉拉公民社会有关的公共信托控制。大学的托管人将从包括特拉凡科皇族 (Travancore royal family) 最资深的成员以及其他一些杰出的国际教育家在内的组群中选择。与美国著名的私立大学相似, 建立斯里帕德玛纳巴史瓦米神大学, 大学应该拥有独立的董事会。学校的经费由基金保障, 向部分负担得起学费的学生收取学费, 并通过研究合同获得收入。同时鼓励额外的捐赠。这

所大学不应受到印度公立大学盛行的政治和官僚主义的影响。新大学不以营利为目的，也不会像一些有商业巨头掌控的新建私立大学那样变幻不定。

大学在发展愿景和规模上都要国际化。教授和学生来自印度和世界各地。大学基金将支付教授的工资和学生的奖学金，尽管不能与美国和欧洲最富有的大学媲美，仍然要具备一定的吸引力。大学课程和关注点将有意识地国际化。同时，大学应该强调喀拉拉邦、南印度和次大陆的重要性。斯里帕德玛纳巴史瓦米神大学也不应该像全球在建的许多世界一流大学那样仅仅关注发展科学学科。它应该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并谨慎甄选大学重点发展的学科领域，包括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学科，如信息技术、部分农学领域，可能还有一些生物技术领域等。由于大学和寺庙之间的特殊关系，新大学可以力争成为世界上有关印度教（Hinduism）、宗教和印度地区研究的顶级机构。由于大学位于喀拉拉邦，该邦有大量印度教、穆斯林和基督教教徒，大学可以培养出不同宗教间的对话交流。大学还可以关注喀拉拉邦和南印度的历史、艺术和社会。大学要谨慎选择学科，要着重建设能创造战略优势和特色的师资力量。

世界一流大学的治理和管理

大学治理是所有大学的核心问题。斯里帕德玛纳巴史瓦米神大学的教师必须拥有对重要学术决策的决定权。同时，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拥有高效的管理，大学的顶层领导必须对战略决策有强大的控制力。大学校长、院长和其他关键领导者将根据他们的才智和领导力而不是个人关系选拔。

这所大学应该是一所顶级精英学校。应该根据学术能力选拔教师与学生。教师一旦被聘用，将在一定时期内接受审慎的教学和研究评估。学生将择优录取，但不设置严苛的筛选制，来自社会底层、能力拔尖的学生将被给予特殊考虑的机会。学生能获得奖学金、助学金和学习辅导等。

有了喀拉拉邦斯里帕德玛纳巴史瓦米神庙空前的资源帮助，印度就有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独有契机。要建设好这所大学，应该借鉴最好的国际经验，并在国际化的背景下重点考虑喀拉拉邦本地区和南印度的需求。免于官僚主义之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机会仅此一次。喀拉拉邦有悠久的高等教育传统，这就为发展一所资金充沛的大学设置了良好的成长环境，也远离新德里的政治干扰。

智利大学分类的新方法

Claudia Reyes、Pedro Rosso

Claudia Reyes: 智利圣地亚哥 Red Universitaria Cruz del Sur 执行主任

Pedro Rosso: 智利圣地亚哥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 Chile 的 emeritus 校长, 教授
电子邮箱: barriga@uc.cl

过去几十年间,特别是 20 世纪 80 和 90 年代,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大学体制经历了剧烈的转型,其中一些国家扩招学生并新建了许多大学,其中大部分是私立大学。这一变革令各个体制中大学的多元性更为显著。在学术维度之外,大学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给以学术研究、排名和公共政策为目的的大学分类带来了严峻的考验。智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智利第一次尝试为全国的大学分类时,以选拔性、规模、地位和公立/私立特征为依据,将大学分成了八类。这一分类法虽有一些优点,却在理念和实践层面上受到批评,比如这八个分类类别都不具有排他性。

其它观察人士也尝试着分类智利大学。他们将选拔性(selectivity)和年发表量作为主要标准,其次是学生数量、认证(accreditation)年限等。他们将智利大学分为七大类,这样的做法比前一次分类有所改进。但是,这一分类法也存在局限性,包括选拔性作为主要指标的适用性问题。比如说,一个类别列出了所有具有选拔性的研究型大学,另一组则被形容为不具选拔性、教学型、大规模和低认证水平的大学,这样组合的道理何在。

新的大学分类方法

为了解决困扰智利大学的分类问题,最近出台了新的解决方案,即将是否具备经过

认证的博士课程、这些专业的数量以及每年在国际索引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作为分类的主要依据。首先,应用第一个标准,大学可以分成两类:(1)不具有经过认证的博士课程;(2)有博士课程。再者,不具有经过认证的博士课程的大学按照论文发表情况可分为两组:(1)年发表国际论文低于 20 篇;(2)年发表国际论文达到或超过 20 篇。其中,第一组被列为“教学型大学”(teaching university),包含 23 所大学;第二组则被列为“进行有限研究的教学型大学”(teaching university with limited research),包含 11 所大学。相应的,具有经过认证的博士课程的大学也分成两类:(1)具有 5 个或以下博士课程,(2)具有超过 5 个博士课程。前一组被称为“在少数领域开展科学研究和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大学”(university with research and doctoral programs in selected areas),包含 11 所大学;后一组是“研究型博士研究生教育大学”(research and doctoral programs university),包含 6 所大学。

不同类别大学的主要特征

如期所料,这四类大学在“首要分类标准”的几个变量上,均值有明显不同。教学型大学年均发表 4 篇国际论文;“进行有限研究的教学型大学”年均发表 41 篇;“在少数领域开展科学研究和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大

学”年均发表 94 篇;“研究型博士研究生教育大学”年均发表 636 篇。“在少数领域开展科学研究和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大学”平均有 2.2 个经过认证的博士课程,“研究型博士研究生教育大学”平均有 18.5 个博士课程。最终,这些分类标准成功地将智利大学区分开来。而尤其令人震撼的是两组“教学型大学”在论文发表数量上也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表明,30%左右的智利大学实际上没有开展科学研究。

四类大学的其他特点

四类大学在大学规模和学术表现(指认证,与大学的论文发表和博士教育指标无关)方面也不同。方差单尾检验分析了四类大学在各变量上的均值区别,目的在于检验四类大学是否在统计意义上有显著区别。此后完成的方差分析进一步说明了问题。分析结果表明,大多数变量上的均值都表现出显著的多样性,包括学生数量、教师数量、有高等学位的教师比例、每个专业的教师数、受认证的专业占比、大学的认证年限等。“教学型大学”和“研究型博士研究生教育大学”之间的区别最大,其他两类之间的区别次之。

宜于比较研究的大学分类新方法

新分类法分出的大学类别与学校的基本特征和学术表现有相关性。所以,为了便于比较,同一类别的大学可以被认为是“学术

同行”(academic peers)。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许多已有的比较研究——包括国内大学排名和国际大学排名,一般忽略了这个方面。从这个角度看,研究型大学特别是那些被视为“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已经成为学术质量范式。认识到一国高校庞杂性的同时,从大学的多样性和本质价值来看,一所大学应该努力的方向和目标是它们应力争在同类别的大学中做到最好。

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分类

适用于智利大学的新分类法可以根据本土实际情况调整后,用于其他国家。新的分类法也可以为一个教育体制就教学型和研究型大学提供全面的诊断。在大学体制中,多样性自有其价值——它意味着为师生提供更多工作和学习选择。

在对大学进行分类和比较的时候,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所有分类都会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失效。未来,随着大学开展越来越多的研究活动、不断打造新的研究生教育项目,许多大学会改变自己所属的类别。然而,那些忠于办学使命的大学在不断改进学术表现的过程中,其分类不会变。最后,在学术王国,真正重要的是办学使命、人力资源、财政资源和提高质量的意愿。所以,对大学进行合理的分类非常重要。

巴西的经济增长与高等教育政策是否相关？

Simon Schwartzman

巴西里约热内卢劳动和社会问题研究所 (the Instituto de Estudos do Trabalho e Sociedade) 所长

电子邮箱: simon@iets.org.br

巴西是新兴经济体之一，正摩拳擦掌准备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角。巴西需要能够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优秀大学帮助国家保持发展势头。因此，巴西需要清晰的政策和明确的计划推动并改进高校的质量水平。然而，与外界的猜测和期待相反，巴西并没有实施这样的战略。

20世纪30年代、二战以后以及2002年以后，巴西分别经历了三轮快速的经济增长周期。每个周期都是由一些有利的外部条件推动的，包括农业和矿业的收入、国际投资的流入、受这些资源资助而不断成长的公共部门、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稳定转移、内部消费市场的发展壮大等因素。正如60年代末和90年代那样，这些发展背后也受到内部经济重组、通货膨胀控制和政府增税能力提高的推动。这几个周期中没有一个是与教育和科技投入有关。拥有更多资源的政府变得更慷慨，愿意满足新兴中产阶级对福利的需求，如免费的教育机会。所以，二战后经济扩张的过程中形成了现有的联邦高校网络；而现有的研究生教育、科学研究和科技网络则建立于70年代，在那之前几年形成的“经济奇迹”正趋向破裂。

过去十年的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20世纪90年代的宏观经济稳定，源于中国并有利于巴西的国际贸易发展，以及农商和矿业公司的能力增长。经济稳定、利率高、汇率虚高，这让巴西成为外国投资者的香饽

饽，也为中产阶级带来更多工作机会。

公共支出和教育的扩张

巴西的经济年增长率稳定在4~5%，公共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则上升到40%，大部分钱花费在社会保障、公务员工资和公共债务等方面。联邦政府受益于不断增加的税收基数，将一些利益向一部分群体倾斜：通过有条件的现金转移项目和最低工资的提高帮助穷人；扩充公务员的队伍，提高他们的工资和社会福利；用公共设施和服务提供的廉价补贴和慷慨合同协助富人；通过对腐败的广泛赦免和宽容来帮助政治联盟。对中产阶级的福利则包括让公立和私立大学提供更多免费的高等教育，以及支持他们有组织的社会运动诉求。

这些选项中没有一个要求国家政策提供优质的高等教育和经济有效的科学技术。巴西如今将5%的国民生产总值花在教育上，大部分钱通过地方政府发放给中小学。尽管最近一些公立大学也得到拨款，但也只覆盖了25%的在校生。虽然一些大学和职业学校确实质量很好，但大多数都不尽如人意，并且现在也没有提高教育质量的机制。政府迫于行业压力而实施的评估只对水平非常低的医学和法学私立学校有作用。研究生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发展主要在圣保罗州的几所联邦大学和联邦研究机构网络中进行。到目前为止，这是拉丁美洲最大规模的研发和研究生教育

基地。但是，这里的研究还主要是学术上的，专利和应用技术很少，研究与国家经济和社会需求的联系也很少。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反例出现。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mbrapa）是巴西一家成功的公司，前身是航空技术研究所（the Aeronautic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即一所由空军开办的技术研究所和工程学校。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的农业研究机构还对农业做出了贡献。国家工业培训服务（the National Service for Industrial Training）由工业联合会（the Federation of Industries）主办，是一所职业培训机构，一直在职业工人资质培训上取得成效。然而，以上例外都不在教育部（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和科技部（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范围内。

简而言之，随着巴西社会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高等教育规模有所扩张，一些学校

的质量也有所提升。这些学校曾经是并仍然属于同一浪潮中的一部分。显然，高等教育可以在没有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成长，但是这种逆势发展（至少目前来说）是不存在的，尽管未来可能会存在。

未来

巴西可能正在步入转型时期。经济日趋复杂，对人口技能和相关研究的需求也日盛。社会上已经有这样的信号告诫我们：新公司抱怨缺乏合格的工程师和中层技术人员，而跨国公司则从国外引进合格的人力资源。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巴西高等教育将不得不把优先事项转变为提高教育质量，并加强教育与经济的联系，而不是一味的寻求经济增长。但是，这一转变并不容易。

新书推介

“Access and Equity in Financing Higher Education in Arab Countries.” *Prospects* no. 157, 1–176, March, 201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教育展望》 (*Prospects*) 的这期特刊重点关注阿拉伯国家的入学机会和财政。文章不仅比较分析了该地区的发展趋势, 还附上了一系列案例研究, 涉及的国家包括约旦、埃及、黎巴嫩、叙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文章讨论了高等教育公共财政和私人财政的国际趋势。

Bhandari, Rajika, and Peggy Blumenthal, ed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Global Mo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National Trends and New Direc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243 pp. \$85 (hb). ISBN 978-0-230-61878-7. Web site: <http://www.palgrave.com>.

该书重点关注国际学生流动的主要国家及其动向, 概述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发展趋势, 并披露了有用的统计数据。除了关注学生流动外, 该书还对政策和行动进行了分析。书中涉及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印度、中国、非洲、拉丁美洲、德国、英国和加拿大。

Bolman, Lee G., and Joan V. Gallos. *Reframing Academic Leadership*.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11. 254 pp. (hb). ISBN 978-0-7879-8806-7. Web site: <http://www.josseybass.com>.

本书作者发现, 大学是一类特殊的组织,

因此学术机构领导力面临非同寻常的挑战。该书是美国大学领导力的实践指导, 重视大学领导人对学术环境的影响, 重视营造人文环境——这是领导责任的一部分。

Cimic, Charles, Neil Gross, and Michèle Lamont, eds. *Social Knowledge in the Making*.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2011. 471 pp. \$30 (pb). ISBN 978-0-226-09209-6. Web site: www.press.uchicago.edu.

该书是一份针对学术文化的原创社会学研究, 使用了档案分析, 注重社会学理论、一些学术领域的同行评估、管理科学客观性的作用等。书中的案例都来自美国, 从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切入。

Cloete, Nico, Tracy Bailey, Pundy Pillay, Ian Bunting, and Peter Maassen. *Universit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 Wynberg, South Africa: Centre for Higher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 2011. 188 pp. (pb). ISBN 978-1-920355-73-9. Web site: <http://www.chet.org.za>.

这卷书重点关注非洲大学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围绕这一主题搜集了博茨瓦纳、加纳、肯尼亚、毛里求斯、南非、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等国的案例。作者们的结论是, 大学需要更加关注其对经济贡献这一目标, 尤其要重视学校的学术核心, 特别是师资问题。

DeMillo, Richard A. *Abelard to Apple: The Fate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1. 320 pp. \$27.95 (hb). ISBN 978-0-262-01580-6. Web site: <http://www.mitpress.mit.edu>.

本书关注美国大学的过去和未来,将大学史与高科技发展联系起来,分析了大学怎样才能最好地服务于现代社会。技术怎样改变高等教育以及技术未来应该在高等教育中扮演何种角色是该书的主要议题。

King, Roger, Simon Marginson, and Rajani Naidoo, eds. Handbook on Globaliz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2011. 539 pp. \$260 (hb). ISBN 978-1-84844-5857. Web site: <http://www.e-elgar.com>.

该书讨论了全球化和高等教育的各种主题,含29个以研究为基础的章节,内容包括大学的全球化、高等教育和新帝国主义、全球化与不平等、各地对全球化的反应、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问题、全球就业市场竞争,还有一系列以国别为案例的章节。

Lane, Jason E., and Kevin Kinser, eds. Multinat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eading, Governing, and Managing International Branch Campuse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11. 116 pp. (pb). Web site: <http://www.josseybass.com>.

这卷书主要从美国的视角对国际分校进行了多层面的讨论。书中讨论的主题包括跨国质量保障、教师管理、学生体验复制、管理国外校区要考虑的问题等。书中精心列出了参考文献。该书是《高等教育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Higher Education)系列之一。

Lindow, Megan. Weaving Success: Voices

of Change in African Higher Education. New York: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1. 218 pp. (pb). ISBN 978-0-87206-342-6.

该书关注高等教育对非洲发展的贡献,主要介绍了各种教育项目对非洲人民的影响,涉及九个非洲国家。书中还关注了一系列其他主题,如图书馆、数据的发展等。

Luescher-Mamashela, Thierry. The University in Africa and Democratic Citizenship: Hothouse or Training Ground? Wynberg, South Africa: Centre for Higher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 2011. 118 pp. (pb). ISBN 978-1-920355678. Web site: <http://www.chet.org.za>.

在非洲,学生政治运动有很深远的传统。这卷书可能是针对学生政治和高等教育管制观点的第一份多国调查。调查的国家包括肯尼亚、南非、坦桑尼亚。书中展现了学生对民主、学生的政治参与等相关问题的看法。

Magolda, Peter M., and Marcia B. Baxter Magolda, eds. Contests Issues in Student Affairs. Sterling, VA: Stylus Publishing, 2011. 504 pp. \$34.95 (pb). ISBN 978-1-57922-584. Web site: <http://www.styluspub.com>.

该书对美国学生事务的几个矛盾问题进行了讨论。全书围绕24个“争议问题”展开,讨论了学生事务的哲学基础,以及推动学习和发展、获得公平学习环境、组织学生事务实践面临的挑战。

Marginson, Simon, and Erlenawati Sawir. Ideas for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New York: Palgrave, 2011. 221 pp. \$80 (hb). ISBN 978-0-230-11793-6. Web site:

<http://www.palgrave.com>.

本书以对澳大利亚国际学生的访谈为基础,两位作者讨论了学生的生活、学习、社会关系,对其经历分出不同的代际。该书的核心是怎样改进国际学生的学术经历和其他相关经历。

Marginson, Simon, Sarjit Kaur, and Erlenawati Sawir, eds.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Strategic Responses to Globalization*. Dordrecht, Netherlands: Springer, 2011. 465 pp. \$189 (hb). ISBN 978-94-007-1499-1. Web site: <http://www.springer.com>.

该书的重点是亚太地区国家及沙特阿拉伯、印度等若干国家的大学对全球化的应对。一些章节围绕亚洲高等教育的儒家模型和跨国高等教育等大问题展开。多数章节讨论了这一地区的国家和特定大学的案例。不出所料,中国吸引了大量关注,书中也讨论了越南、柬埔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其他几个不经常被分析的国家。

Parra-Sandoval, Maria Cristina, Ana Julia Bozo de Carmona, and Alicia Inciarte Gonzalez. *University: The Last Call?* Maracaibo, Venezuela: Universidad de Zulia, 2010. 235 pp. (pb). ISBN 978-980-12-4428-8. Web site: <http://www.luz.edu.ve>.

该书提出了一个针对拉丁美洲大学的新观念,并以委内瑞拉为案例。该研究关注高等教育现实和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作者指出,一个新的高等教育模式正在委内瑞拉兴起。

Pasztai, Gabriella, ed. *Relig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Debrecen, Hungary: 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Univ. of Debrecen, 2010. 310 pp. (pb). ISBN 978-963-473-372-0. Web site: <http://www.revacern.eu>.

这卷书对波兰、罗马尼亚以及捷克斯洛伐克与宗教相关的高校进行了案例研究,并对斯洛文尼亚、奥地利、保加利亚、乌克兰等国家的宗教学院进行了额外分析。书中还分析了匈牙利和波兰学生的宗教观点。

Post, Robert C. *Democracy, Expertise, and Academic Freedom: A First Amendment Jurisprudence for the Modern Stat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77 pp. \$30 (hb). ISBN 978-0-300-14863-3. Web site: <http://www.yalebooks.com>.

本书讨论了美国对学术自由的法律观点。当前言论自由在法律体制中面临挑战。书中也讨论了这一背景下学术自由面临的挑战,分析中涉及高等教育。

Regini, Marino, ed. *European Universities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Market*.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2011. 233 pp. (hb). ISBN 978-1-84980-403-5. Web site: <http://www.e-elgar.com>.

本书中,来自意大利的研究人员分析了欧洲大学对过去半个世纪高等教育面临压力的反应。该书最重要的主题是“市场观念”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其中收录了对英国、荷兰、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六个国家的案例研究。

Rhoads, Robert A., and Katalin Szelényi. *Global Citizenship and the University: Advancing Social Life and Relations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 Press, 2011. 327 pp (pb). ISBN 978-0-8047-7542-7. Web site: <http://www.sup.org>.

全球化与公民角色的联系是本书的重点。作者们对高等教育的新自由主义持批判态度,关注学生和学术机构的社会参与。书中收录了美国、阿根廷、匈牙利和中国的案例。

Solomon, Clare, and Tania Palmieri, eds. *Springtime: The New Student Rebellions*. London: Verso, 2011. 283 pp. \$14.95 (pb). ISBN 978-1-84467-740-5. Web site: <http://www.versobooks.com>.

本书从历史的视野收录了一系列有关当今世界学生运动的短文、片段、图像和回忆,其中一些由活动家们亲自写就。书中涉及的地区包括英国、意大利、加利福尼亚、法国、希腊和突尼斯。

Sutin, Stewart E., Daniel Derrico, Rosalind Latiner Raby, and Edward J. Valeau. *Increas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Community College Financial Model: A Global Perspective for the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Palgrave, 2011. 296 pp. (hb). ISBN 978-0-230-10536-2. Web site: <http://www.palgrave.com>.

该书主题广泛,主要围绕社区学院和高等职业学校的筹款问题,包含一系列案例研究。大部分是对美国的分析,也有一些涉及中国、乌干达和英国的案例分析。

Sutton, Susan Buck, and Daniel Obst, eds. *Developing Strategic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s: Models for Initiating and Sustaining Innovative*

International Linkages. New York: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1. 234 pp. \$39.95 (pb). ISBN 978-0-87206-344-0. Web site: <http://www.iie.org>.

该书收录了美国大学和其他国家建立国际伙伴关系的20个案例研究,一些章节提供了取得成功、避免失败的指导意见,涉及学生交换、研究合作、发展中国家的大学能力建设等问题。书中涉及的机构包括大学、本科生院和社区大学。

Turner, David Andrew. *Qua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Rotterdam, Netherlands: Sense, 2011. 110 pp. (pb). ISBN 978-94-6091-682-3. Web site: <http://www.sensepublishers.com>.

本书讨论了英国教育质量相关的各种问题。涉及的主题包括学生体验、多样性、排行榜等。

Walsh, Taylor. *Unlocking the Gates: How and Why Leading Universities Are Opening Up Access to Their Cours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2011. 320 pp. \$29.95 (hb). ISBN 978-0-691-14874-8. Web site: <http://www.press.princeton.edu>.

该书概述了美国大学学术公开课的各种动向,收录的案例包括耶鲁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和MIT著名的“开放课件”行动(Open Courseware initiative)。书中还提供了一个印度的例子作为早期失败的案例。

Welch, Anthony. *Higher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sia: Blurring Borders, Changing Balance*. Abingdon, UK: Routledge, 2011. 195 . \$140 (hb). ISBN 978-0-415-43501-7.

Web site: <http://www.routledge.com>.

该书分析了五个主要的东南亚国家当前的高等教育发展，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越南。尽管不同的章节围绕不同的主题，但首要的关注点是东南亚高等教育中的私立部门以及公共部门的私有化。该书是少有的分析该地区高等教育最新发展趋势的著作。

Yu, Kai, Andrea Lynn Stith, Li Liu, and Huizhong Chen. *Tertiary Education at a Glance: China*. Rotterdam, Netherlands: Sense, 2012.

116 pp. \$39 (pb). ISBN 978- 94-6091-744-8.

Web site: www.sensepublishers.com. Also published by Shanghai Jiao Tong Univ. Press.

Web site: <http://www.jiaodapress.edu.cn>.

该书展示了中国高等教育全方位的统计数据，介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一些章节讨论了体制的发展历史和现有结构。统计数据关注中国中等后教育机构中各类学生的人数、学校的多样性、高等教育财政、各类教师数、入学机会、毕业生和就业率问题、研究能力和成就等。

